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物理维度的历史

纵观历史,自文明曙光初现,原始人为了生存必须进行大量的体力活动（Duncan & Watson， 1960）。在古代,斯巴达人非常重视体育锻炼,他们的体育锻炼由国家统一管理,并根据年龄确定,男女老少都接受类似的锻炼（Phillips & Roper， 2006）。然而,体育锻炼在哲学层面上始终与身体层面息息相关。以下文献改编自Lynch和Soukup （2016)的研究。

雅典人最早认识到身体素质对其他健康维度（包括智力、情感、社交和精神)的促进和影响。与雅典人类似,罗马人也认识到体育锻炼对生活质量的益处,但罗马人更倾向于较为温和的运动方式（Phillips & Roper， 2006）。可以说,古代雅典人和罗马人开展体育教育的目的与今天的健康与体育教育（HPE)类似,都以促进身心健康为核心 旨在全面提升身心健康。因此,本章内容与儿童整体发展要素、社区联系（优势视角)以及以运动为优先的要素（即参与、归属感和接受体育教育)紧密相关（参见图1.2）。

Whipp概括了与“福祉”密切相关的HPE理念的历史和现在的意义。

© 编辑（如有)和作者,由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独家授权,2024 年。T. Lynch， 《体育与福祉》， https://doi.org/10.1007/978-3-031-72874-7_7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 过去,古希腊的理想“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Mens sano incorpore sano)强调了身心健康的重要性……本通讯强调了以教育为基础的综合性战略健康方法的重要性,并重视健康和体育教育者的作用。 (2015,第111页)

正如本书通篇所述,整体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对于教育而言并非一个新概念,但近年来,人们更加认识到学习领域对儿童全面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以及身体维度在健康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新冠疫情凸显了身体健康在所有其他健康维度中的重要性。

公元二世纪,盖伦解剖人体时,人体客体化的过程就已显现。盖伦并不认为自己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的只是他所相信的(Kirk, 1993)。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是第一个对肌肉及其功能进行精确描述的人,但他的著作直到十八世纪末才得以发表(Broekhoff, 1972)。 1679年,博雷利以机器的比喻来解释人体,并“为理性化的体育锻炼体系的出现铺平了道路”(Kirk, 1993,第14页)。

中世纪时期,伊丽莎白女王与天主教会的关系时好时坏,而天主教会对欧洲文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教会“渗透到文化的方方面面 学术、政治、经济,甚至个人的私人生活”(Mechikoff & Estes, 2002,第104页)。尽管有时教会并不支持体育教育(Lynch, 2004),但在此期间,一些关键人物积极倡导体育教育,例如圣多明我(1170-1221)、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和教宗庇护二世(1405-1464)(Feeney, 1995)。这种与教会的联系加强了体育教育与健康精神层面之间的关联(Lynch, 2015)。当今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确保高质量的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可以充分发挥其在精神层面的潜力”(Lynch, 2015,第217页)。

欧洲对体育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意大利教师维托里诺·达·费尔特雷(1378-1446)首次将整体体育引入学校课程,作为培养“理想公民”的必要组成部分,涵盖身体、思想和精神(Phillips & Roper, 2006)。

另一位欧洲教育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古茨穆特斯(1759-1839)因其体育教育的专业化而获得认可。当时的德国,以及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瑞典和丹麦主要将体育课视为军事训练。因此,体育课的重点在于队列训练、体能训练、强制、纪律和控制,而非娱乐（Kirk & Twigg， 1993）。GutsMuths在德国施内普芬塔尔教育学院制定了一套体育课程大纲。

该课程大纲成为体育教学的平台,主要内容包括体操（Phillips & Roper， 2006）。瑞典的佩尔·林（1766–1839）是第一个推广体育教育医学益处的人,他经常将体育教育与科学论述联系起来,并提倡体育教育的各种健康维度。

在近代晚期,自19世纪中期以来,代表民众利益的管理机构（也称为组织)数量激增。威廉·G·安德森被认为是如今的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协会（SHAPE America)的创始人,他于1885年创立了该组织。2014年,美国健康、体育、娱乐与舞蹈联盟（AAHPERD)的理事会更名为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协会（SHAPE America）。这是AAHPERD自其最初成立之初 体育教育促进协会（AAPE)以来的第七次更名（Yang， 2015）。自Per Ling时代以来,体育教育取得了显著发展,并且“在许多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Kirk， 2013,第974页）。

在全球范围内探索体育教育,考虑到柯克所阐述的增长,并理解协会代表着人群;我们不能忽视国际健康、体育、娱乐、运动和舞蹈理事会（ICHPER-SD)的影响。

尽管体育教育领域没有一个统一的代表机构,但国际体育与休闲教育协会（ICHPER)的影响力不容忽视。ICHPER的成立旨在让教育工作者“能够在国际层面上开展合作……该协会不代表任何单一国家、体系或体育教育方法”（Hircock， 1988,第73页）。ICHPER-SD由美国体育与休闲教育协会（AAHPERD,即SHAPE America)发起,该协会于1958年在意大利罗马成立。首届ICHPER世界大会的主题是“儿童健康与学校”。大会的主题表明,其重点在于推广体育教育中的健康维度。Corbin指出,这在当时是一致的，“‘新体育教育’的核心是全面发展儿童”（Corbin， 2016,第14页）。

ICHPER-SD 对世界许多国家产生了影响,并认可与雅典人相似的健康、体育和娱乐 (HPE) 方法。其中一个直接影响体现在 1970 年于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 ICHPER-SD 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大洋洲举办的世界大会上。澳大利亚健康、体育和娱乐理事会 (ACHPER) 正式成立。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该组织原名为澳大利亚体育教育协会 (APEA),更名是 ICHPER-SD 大会的直接结果。正如 Kirk 和 Macdonald 引述的会议报告所述:“大会表明‘我们澳大利亚现在已成为国际舞台的一部分’,或许正是通过 ICHPER 产生的这种国际联系感(归属感),以及大会的巨大成功,促成了澳大利亚人接受这一名称” (1998 年,第 6-7 页)。

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在1970年国际人机交互规划与管理大会(ICHPER)世界大会决议的十点中的第一点就可见一斑:

> 健康、体育和娱乐是密切相关的领域,应该为了社区的最大利益而进行协调。
>
> (ICHPER, 1971,第189页)

此外,正如 Kirk 和 Macdonald 所引述的,Elaine Murphy(1988-1993 年 ACHPER 全国主席,以及 ICHPER-SD 大洋洲副主席)指出:“我们对体育教育的描述并不充分,因为健康是我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希望加入这些词语,否则他们认为体育教育的定义过于狭隘” (1998,第 7 页)。ICHPER-SD“也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工作,以启动和加强学校及高等教育机构的项目和领导力”(Kane, 1989,第 107 页)。虽然 ICHPER-SD 是 SHAPE America 的一个分支机构,总部设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雷斯顿,但它是独立管理和运营的。然而,近年来,这类国家和国际组织越来越难以维持会员数量,进而难以保持财务上的可持续性。

这迫使人们思考,在科技进步使得全球联系日益紧密(例如通过社交媒体)的时代,他们的存在意义和必要性究竟何在。2019年,许多ICHPER-SD的前成员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旨在重振这个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组织的宗旨。

国际健康、体育、舞蹈和运动联盟(IAHPEDS)成立:

> 国际健康、体育、舞蹈和运动协会(IAHPEDS)由来自世界各地健康、体育、舞蹈和运动领域的专业人士管理。其总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但会员遍布全球。协会每四年举行一次选举。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担任执行委员会、董事会和理事会职务多年。

作为一家非营利性[美国501(c)(3)免税组织]慈善和教育机构,IAHPEDS的使命是:

- 促进联盟各学科领域研究人员、从业人员和学生之间的国际研究、学习、实践和标准,以激励个人养成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

- 倡导在学校、高等教育机构、系统和社区中推广高质量的全球健康与体育教育、舞蹈和运动(IAHPEDS)。

- 提供平台,用于分享与健康、体育、舞蹈和运动 (HPEDS) 相关的信息。· 国际健康、体育、舞蹈和运动协会 (IAHPEDS) 寻求与其他国际和国家专业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以扩大健康、体育、舞蹈和运动研究及项目的影响范围(https://iahpeds.org/, 2024)。

以健康预防为重点的健康管理需要建立联系和伙伴关系。这一视角为教育部门和政府在学校实施健康与体育教育(HPE)以及在社区开展体育运动提供了指导。宏观趋势预测,未来教育部门需要做好准备,应对资源有限的世界、南北东西转移、医疗保健成本上升以及生活方式和服务方面的相应变化,以及社会关系日益重要的局面(Hajkowicz et al., 2012)。然而,正如文献所表明的,资源有限一直是现代健康与体育教育面临的难题,至今依然如此(Cale & Harris, 2019;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992; Hardman, 2008; UNESCO, 2008; 2014)。此外,面对资源有限,教育工作者往往倾向于采用行为主义方法来实施体育教育,但这反而会阻碍健康教育的开展(Westbrook et al., 2013)。

与 HPE 相关的领域的伙伴关系属于“优势导向”方法,该方法“支持对健康教育的批判性观点,重点关注学习者,将其置于社区的结构性促进因素、资产和限制因素之中,并通过以资源为导向和提升能力的学习方法来实现”(Macdonald, 2013 年,第 100 页)。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基于优势的方法的一个例子是安东诺夫斯基的健康生成模型,该模型包括:

· 更注重推广健康生活方式,而不是
预防疾病;· 将健康
生活视为多维度的,涵盖生理、社会、心理、精神、环境和社区等多个层面;· 将健康视为
一个动态的过程。

成为;
· 将健康视为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是更广泛、更丰富的内涵;· 承认人类是积极的行
动者,与自然环境息息
相关。
环境;以及
· 健康本身并不被视为最终目标,而是被视为美好生活的重要前提。(McCuaig 等
人, 2013 年,第 113 页)。

从健康促进的角度,特别是通过伙伴关系,采取基于优势的方法,倡导为生活和福祉做好准备,使知识和技能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中转移和调整(Lynch, 2016)。

有证据表明,整体性健康与体育教育(HPE)理念自雅典时代起就已存在并不断发展,并在20世纪蓬勃发展,尽管当时它被称为“体育教育”。如前所述,Robbins等人提出了健康(HPE理念)的七个维度,统称为福祉:身体、智力、情感、社交、精神、环境心理和职业健康。此外,“这些维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2011,第9页)。研究表明,“所有学校都应该重视HPE,因为它能够以整体的方式提供各种机会”(Lynch, 2015,第217页)。纵观历史,体育教育一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它始终被用来代表多种论述、意识形态、哲学以及运动发展的各个方面。

对历史的探究表明,体育教育深受两种哲学思想的影响:(1) 将身体视为客体;(2) 关注人的整体观,包括身、心、灵和福祉。理解这两种哲学思想对于认识体育教育至关重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PE是社会建构的,因此语义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

文献表明,在历史上,体育教育有时扮演着“训练”身体的角色,将身体视为客体。这种将身体视为客体的做法出现在“当男性（和女性)能够将自己的身体视为物品”的社会中（Broekhoff， 1972,第88页）。Kirk将这一概念描述为“一个有用且受控的身体,它具备满足特定社会可接受的社会行为标准并在经济体系中做出生产性贡献的能力” （1993,第13页）。重申一下,影响这一理念的体育教育相关论述包括军事、科学、健康和运动 这些论述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包括性别歧视、精英主义、健康主义、个人主义和中胚层主义 这些内容将在后文（参见第11章)进行更详细的讨论（Colquhoun， 1991,1992； Hickey， 1995； Kirk ,1992； Kirk & Twigg， 1993； Scraton， 1990； Tinning， 1990； Tinning & Fitzclarence， 1992； Tinning,Kirk & Evans， 1993）。其中,学生在学校环境中会无意间习得这些知识和态度（Kirk， 1992）。这些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传递了错误的信息（Kirk， 1992）。 “身体教育”一词对于这种“身体作为客体”的哲学来说是恰当的,因为它采用了以行为为主导的健康教育方法（参见第8 章）。

体能素养

正如Lynch和Soukup （2016)所发表的,由于PE和HPE这两个术语含义模糊,一些新术语应运而生,旨在代表和取代体育教育的原始含义,其中之一便是“体能素养”（Physical Literacy,简称PL）。Grauduszus、Koch、Wessely和Joisten研究了以学校为基础的PL干预措施,并指出“由于其结合了身体、认知和情感领域的整体方法,体能素养（PL)的推广似乎很有前景” （2024,第1页）。因此,他们采用了PL一词来代表整体性的体育教育。Corbin指出,体能素养并非一个新术语,早在20世纪初和50年代末就有人提及（2016,第15页）。早期对体能素养的定义是指能够读写（Corbin， 2016） ,但“广义上讲，‘素养’意味着接受教育”（Richards， 2016,第1页）。体育教育一直是……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过去人们熟知的教育方式是“通过身体进行教育”（Corbin， 2016,第14页）,因此，“读写能力”和“教育”的语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Lounsbery & McKenzie， 2015）。

高质量的体育教育要素被重新确立为“体能素养”这一新旧概念的关键要素。理查兹在文献中指出,常见的观点包括“体能素养是一个终身过程,掌握基本运动技能是其核心要素,并且它涵盖了促进自信运动的知识、态度和动机” （2016,第1页）。林奇和苏库普认为，“与健康体育教育相比,体能素养（PL)的定义决定了它只关注一个维度”,并且“体能素养尚未在国际体育教育领域或该学科的知识体系中得到定位” （2016,第19页）。凯尔和哈里斯（2019)阐述了体能素养如何在英国影响学校的体育活动和体育教育。在他们的书中,他们声称要提供一个关于体育活动的整体视角,但同样只关注了一个维度 身体维度。

根据Barnett等人的研究，“过去五年中,儿童和青少年体能素养的研究兴趣激增”（2023,第1906页）。传统上,关于体能素养的出版物通常由政府资助的机构和部门出版，而这些机构和部门并非总是与教育相关（参见第28页）。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该概念的演变,也是人们对“教育”（建构主义)和“学校教育”（行为主义)这两个术语误解的结果（参见第56页）。在澳大利亚,最初关于体能素养的有限文献主要由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Richards， 2016)和国家体育研究所出版。同样,在英国,青少年体育信托基金也制定了小学体能素养框架。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健康积极生活和肥胖研究小组”,该小组被认为是体能素养评估领域的领导者（Corbin， 2016）。

“体能素养”一词对不同机构而言含义各异。文献指出,这可能会给教师和学生带来困惑（Corbin， 2016； Griggs， 2015； Lounsbery & McKenzie， 2015； McKenzie & Lounsbery， 2016）。而通常发表在体育教育领域的研究论文,却又与体能素养相关，这只会加剧实践者之间的困惑。例如,Rukavina 和 Gremillion Burdge （2024)指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全校参与的体育活动和健康促进方法有可能提高学生的体能素养”（第1页）。此外，另一项研究“表明，将体能素养融入干预措施中，可以提高学生的体能素养”。

积极的课间活动可以促进与健康相关的身体素质，特别是增强有氧运动能力和力量……并提高学业成绩”（Zhang et al., 2023, p. 382）。Lounsbery 和 McKenzie (2015,

第 143-144 页)提醒人们谨慎使用体能素养，因为它被认为是
补充本已不清晰的学习领域。

> “体能素养”一词被美国国家K-12体育标准采用，既没有广泛咨询专业人士的意见，也没有……
> 市场调研。迄今为止，其应用普遍已得到证实。
> 它将有助于通过提供更多服务来提升该行业的地位。
> 为了清晰起见，并与当前的通识教育趋势保持一致。我们
> 完全同意需要明确PE（个人陈述）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尚无证据表明
> 使用和推广“体能素养”这一术语会有所帮助。
> 目前关于体能素养的同行评审出版物非常少，而且没有。
> 这些都是基于数据的。

这种混乱也存在于教育领域。在英国，
体育教育协会（AfPE）对体育教育的定义参照了以下方面：
“学校教育”的概念，而非归属感、存在感和成长感。
“受过教育的”：

> 学校课程中开展的有计划、有进度的学习
> 课程安排在课表中规定的时间内，面向所有学生。这包括以下两方面：
> “学习运动”（即提高身体机能）和“运动”
> 学习（例如通过运动学习，以及超越身体活动的各种技能和理解，例如与他人合作）。
> 学习的背景是体育活动，孩子们将体验到
> 活动范围广泛，包括体育运动和舞蹈。 （2016）

英国和澳大利亚一样，都有全国统一的课程，但澳大利亚的
庞大的规模（与美国类似）在各个方面造成了许多一致性方面的障碍。
所有地区。因此，各个州和地区的框架由此衍生而来。
根据国家文件，英国的国土面积小得多，因此，他们的国家课程似乎更容易实施。

相比之下，表现得更加一致。国家级的关键学习领域
英格兰的课程名称为“体育教育（2024）”。值得注意的是，该课程提倡高质量的体育教育（简称“体育教育”）。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高质量的体育教育（PE)而非体能素养（与美国不同），尽管如前所述,它似乎确实受到了体能素养概念的影响（参见第70页）。作为一项独立的学习领域,英格兰（2024b)设有个人、社会、健康和经济教育（PSHE），其中建议：

> 学校应酌情利用 PSHE 教育,在国家课程、基础学校课程和法定指导中已概述的法定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以下方面:毒品教育、金融教育、性与关系教育 (SRE) 以及体育活动和饮食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因此,如前所述,PSHE并非强制性课程,学校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实施这些指导方针。由于PSHE是选修课,英国似乎用体能素养填补了“儿童全面健康发展”理念的空白。Jurbala （2015)的观点支持这一理论,他认为体能素养已成为“全面发展”的替代术语。

麦肯齐和朗斯伯里（2016,第1页)提出疑问：“名称有何意义?体能素养难道只是换了个名字的玫瑰吗？”此外,他们还提出：

> 国际体育活动/健身专家对于体能素养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如果连专家都对体能素养的概念感到困惑,那么普通民众和政策制定者又该有多么迷茫呢?许多人已经难以区分体育活动、体能和体育教育等术语,如果再增加一个术语（体能素养），只会加剧这种混乱。

如前所述,简而言之,体能素养就是体育教育（Kirk， 2013）。Kirk将体能素养描述为“一种关于体育教育的哲学立场” （2013,第 975 页）。这种立场与体育教育中的整体性论述相关,并植根于包容性的理念之中。例如,Ardiano 发现“对体能素养的深刻理解与 7-12 岁儿童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2024,第 21 页）。

因此,许多体能素养特征并非新颖,而是借鉴自体育教育,特别是与“高质量体育教育”和“终身体育教育”相关的文献。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根据 Lynch (2017) 的QPE：

· 促进儿童身心健康 · 是一种有计划、循序渐进
且包容的学习体验 · 要求所有儿童都有机会掌握基本运动技能（FMS），
最好在七岁之前掌握 · 要求教育者具备运动基础知识

心理和包容性的社会文化方法

社会文化方法的引入标志着体育教育理念的转变，并引入了“整体性”话语。这种整体性观点受到包容性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世界某些地区被重新命名为健康促进体育教育（HPE）。这种转变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但最近一次是作为一种复杂的反驳话语出现，旨在对抗那些与“身体作为客体”哲学相关的观点。这种话语改变了人们对身体的认知，不再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客体，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人”，包括身体、心理、精神和福祉。

反射

本章肯定了整体健康、体育与体育教育（HPE)理念自雅典时代以来就已存在并不断发展，并在二十世纪蓬勃发展，尽管当时它被称为“体育教育”。你觉得这段历史的哪些方面有趣？此外，本章还探讨了“体能素养”这一术语的演变原因。在你的语境中，人们用哪些术语来指代体育教育？“体能素养”这个术语是否被使用？在你的语境中，人们了解“体能素养”的含义吗？人们是否觉得体育教育领域中使用的各种术语令人困惑？

参考

Ardiano, PA (2024). 基于体能素养的小学体育活动对提高学生基本运动技能的影响分析. Gladi: Jurnal Ilmu Keolahragaan, 15(01), 10–23. https://doi.org/10.21009/GJIK.151.02英国体育教育协会。(2016)。健康立场文件。检索自英国体育教育协会网站： http://www.afpe.org.uk/images/stories/afPE_Health_Position_Paper_Web_Version.pdf 。

Barnett, LM, Jerebine, A., Keegan, R., 等 (2023)。为学龄儿童设计的体能素养评估的有效性、可靠性和可行性：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系统性综述。运动医学,53,1905–1929。https : //doi.org/10。
1007/s40279-023-01867-4
Broekhoff, J. (1972). 体育教育与身体的物化。
Gymnasion， 4,4–11。
Cale, L. 和 Harris, J. (2019)。在学校推广积极的生活方式。人类
动力学。
科尔昆,D.（1991）。基于健康的体能训练、健康主义意识形态和
指责受害者。 《体育教育评论》， 14(1),5-13。
科尔昆,D.（1992）。技术官僚理性与医疗化
体育课程。体育教育评论， 15(1),5-11。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体育与运动教育 一份报告
由参议院环境、娱乐和艺术常设委员会提出。
堪培拉,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参议院印刷局。
Corbin, C. (2016). 体能素养对研究和实践的影响:A
评论。运动与锻炼研究季刊,87 （1）,14-27。
英国教育部。(2024)。英格兰国家课程:
体育教育课程设置。 摘自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national-curriculum-in-england-physical-e
英格兰体育教育课程学习#第一阶段。
英国政府部门（2024b）。社会、健康和经济教育。https ://www.gov.uk/ 指导 个人的，
government/publications/personal-social-health-and-economic-edu 摘自

pshe-教育。
邓肯,R.和沃森,H.（1960）。体育教育导论。罗纳德出版社。
按。
Feeney, R. (1995).天主教视角:体育锻炼与运动。阿奎那出版社
按。
Grauduszus, M.、Koch, L.、Wessely, S. 和 Joisten, C. (2024)。校本
促进体能素养:范围界定综述。 《公共卫生前沿》
12, 1322075. https://doi.org/10.3389/fpubh.2024.1322075
Griggs, G. (2015).理解小学体育教育。Routledge出版社。
Hajkowicz, S.、Cook, H. 和 Littleboy, A. (2012)。我们的未来世界:全球
将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大趋势。摘自http://www.
csiro.au/en/Do-business/Services/CSIRO-Futures/Futures-reports/Our-Future-World。
Hardman, K. (2008). 学校体育教育:全球视角。
运动机能学,40,5-28 。
希基,C.（1995）。体育课能算是体育课吗？ 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 42(3),4-7。
Hircock, B. (1988). ICHPER 的历史。 《体育与舞蹈杂志》，
59(2), 73。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Jurbala, P. (2015). 什么是真正的体能素养？ Quest, 67, 367–383. https://doi.org/10.1080/00336297.2015.1084341

Kane, J. (1989). 国际健康、体育和娱乐理事会 (ICHPER).国际教育评论, 35(1), 107。

柯克,D.（1992）。体育教育、话语与意识形态:揭示隐藏的将课程纳入视野。Quest ,44,35-36 。

柯克,D.（1993）。身体教育与文化 专著。迪肯大学按。

Kirk, D. 和 Twigg, K. (1993)。澳大利亚学校体育训练的军事化:初级学员训练计划的兴起和消亡,1911-1931 年。教育史， 22(4),319-414。

Kirk, D. (2013). 体育教育中的教育价值和基于模型的实践。 《教育哲学与理论》， 45(9),973–986。https ://doi.org/10.1080/00131857.2013.785352 Kirk , D. 和 Macdonald, D. (1998). 体育活动专业的演变:团结、多样性与澳大利亚健康、体育和娱乐委员会（1970–1997）。 《体育传统:澳大利亚体育史学会期刊》， 15(1),3–24。

Lounsbery, M. 和 McKenzie, T. (2015). 身体素养与身体教育:换个名字也一样好？ 《运动与健康科学杂志》， 4,139–144。https ://doi.org/10.1016/j.jshs.2015.02.002 Lynch, T. (2004). 天主教教育视角下的学校健康、体育和体育课程的重要性。ACHPER健康生活方式杂志， 51(2–3),7–11。

Lynch, T. (2015). Investigating children s spiritual experiences through the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learning area in Australian schools.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54(1), 202–220.

Lynch, T. (2016).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未来:通过本地和全球社区伙伴关系优化儿童的健康和福祉。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https ://doi.org/10.1007/978-3-319-316 67-3

Lynch, T. (2017). 体育教育:培养儿童的健康和福祉 - 见 Garvis, S. & Pendergast, D. 通过运动和运动技能（编）， 《儿童健康与福祉》 （第2 版,第77-94页）。剑桥。

Lynch, T., & Soukup, GJ (2016). “体育教育”、“健康与体育教育”、“体能素养”和“健康素养”:全球术语混乱。 《Cogent Education》， 3(1),1217-1220。https ://doi.org/10.1080/2331186X.2016.1217820 Macdonald, D. (2013). 新的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课程改革渐进主义的案例/支持案例？ 《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 4 (2),95-108。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McCuaig, L.、Quennerstedt, M. 和 Macdonald, D. (2013)。以健康促进、优势为基础的方法作为指导 HPE 课程变革的理论。
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 4(2)，109-125。
McKenzie, T. 和 Lounsbery, M. (2016)。体能素养与玫瑰：莎士比亚会怎么说？ 《体能活动计划联盟关于体能活动与健康的评论》，第 2 卷。http : //www.physicalactivityplan.org/commentaries/McKenzie.html

Mechikoff, R. 和 Estes, S.（编）。（2002）。体育与体育教育的历史与哲学：从古代文明到现代世界。麦格劳-希尔出版社。

Phillips, M. 和 Roper, A. (2006)。体育教育史。载于 D. Kirk、D. Macdonald 和 M. O Sullivan (编)，《体育教育手册》 （第 123-140 页）。Sage 出版社。

Richards, R. (2016).体能素养与运动。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
Robbins, G.、Powers, D. 和 Burgess, S. (2011)。健康的生活方式（第 9 版）。
麦格劳-希尔。
Rukavina, P. 和 Gremillion-Burdge, P. (2024)。加强全校体育活动模式以促进体能素养：超越组成部分方法。 《运动机能学评论》（2024 年在线发表）。2024 年 5 月 25 日检索自https://doi.org/10.1123/kr.2023-0018

Scraton, S. (1990).性别与体育教育。迪肯大学出版社。
国际健康、体育与娱乐理事会（ICHPER）。（1971）。国际健康、体育与娱乐理事会第十三届国际大会。载于《第十三届 ICHPER 大会论文集》，澳大利亚悉尼，1970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3 日（第 2-189 页）。

国际健康、体育和娱乐理事会。
Tinning, R. (1990).意识形态与体育教育：打开潘多拉魔盒。
迪肯大学出版社。
Tinning, R., & Fitzclarence, L. (1992). 后现代青年文化与澳大利亚中学体育教育危机。Quest , 44(3), 287–303。
Tinning, R.、Kirk, D. 和 Evans, J. (1993)。健康主义与日常体育教育。载于迪肯大学， 《体育教育批判课程视角读本》 （第 77-94 页）。迪肯印刷服务公司。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08)。亚洲体育教育和运动的创新实践。检索自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58509。

Westbrook, J., Durrani, N., Brown, R., Orr, D., Pryor, J., Boddy, J., & Salvi, F. (2013). 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学、课程、教学实践和教师教育。检索自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 data/file/305154/Pedagogycurriculumteaching- practices-education.pdf。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Whipp, P. (2015). 优质健康与体育教育:促进身心健康。运动与锻炼医学开放期刊， 1(3),111-113。

杨迪（2015）。2015 年 ICHPER-SD 论坛特别备忘录。
国际健康、体育、娱乐、运动与舞蹈理事会（ICHPER-SD）。

张丹、史莉、朱晓、陈珊、刘艳 (2023)。将体能素养融入课间活动干预对中国儿童体能和学业成绩的
影响。《运动科学与健身杂志》， 21(4),376-384。https ://doi.org/10.1016/j.jesf.2023.09.004